

汉末中原清谈与江南的关系考论

一

两汉时期江南的文化学术,是在中原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中原士人因战乱或政治因素被迫南迁,前者如士燮先祖在西汉末大乱中避居交州,后者如会稽山阴的郑弘家族,本是齐国临淄人,因汉武帝徙强宗大姓而移居山阴;二是中原官吏南下就职,或大力推举文教,如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先用明经”,或本身是重要学者,对当地学风有潜移默化的薰染,如卢植,能通古今学,熹平四年(175)九江蛮反,拜九江太守,不久南夷反,又拜庐江太守;三是江南人士进京就学,学成后回乡教授,典型的是王充,他“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与之相似的还有豫章南昌的程曾,史书说“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正是得益于两汉之际与中原政治文化的不辍交流,东汉末江南的清谈风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东汉末年的中原清谈名士,与江南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江南清谈风气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兹撷数例分析如次。

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末期的著名学者,喜好藏书,著述繁富。灵帝光和元年(178),因作《对诏问灾异八事》遭到宦官曹节、尚书令阳球等人的嫉恨,流放五原,次年四月遇赦,却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王智是权阉王甫之弟,蔡邕担心不能免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泰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避祸吴会期间,蔡邕接触到江南士人的著作,而这些作品尚不为中原所熟悉。因此研究蔡邕的交往与传授事迹,不仅能管窥出中原清谈风气如何影响到江南,而且能够了解江南士人对清谈风气的贡献。

蔡邕与清谈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体现在

积极参与清谈活动。《世说新语·品藻》说: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壮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世人讨论陈蕃和李膺的功德,不能论定先后次序,蔡邕各举其性格之一点稍加评论,即折服众议。这属于就人物个性进行品评的方式,体现了蔡邕在清谈方面的重要影响力,颇有清谈领袖的意味。

其次,蔡邕乐于推举清谈后进,尤其在陈留边让一事上最为显著。边让《后汉书》本传说他少时即已博学善辩,有写作才能,司马彪《续汉书》说他与孔融、陶丘洪,“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已被认作读书人的偶像。蔡邕很是欣赏他的才华,认为他“宜处高任”,因此写信推荐道:

窃见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检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

边让的谈论之才,在当时已经享有盛誉,史书说“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羨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侯焉”^①。士林清谈领袖郭泰对立亦多推崇,《郭林宗传》载:“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②蔡邕推崇边让“心通性达,口辩辞长”,而郭泰常常与之夜以继日的谈论。蔡邕、郭泰皆一时之俊彦,因边氏的辩论之才而敬重有加,那么蔡邕对清谈的熟悉和支持更不待言了^③。

蔡邕对江南的士人颇为赏识。他对王充的

《论衡》评价很高,这将在下文详细讨论,此处从略。又对会稽赵晔表达了称赏之情,史书说:“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①《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引《会稽典录》中朱育之语,说王朗问虞翻会稽有哪些英俊,虞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駉駉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②如此,在会稽士人看来,赵晔与王充都是以学术著名的。而蔡邕读到《论衡》的时间早于《诗细》,说明前者的影响力更大。至于说《诗细》优于《论衡》,应该是《诗细》属于纬书,符合东汉儒家学术风气的缘故。另外,吴地的顾雍也受到蔡邕的欣赏和指点,史书说蔡邕“在吴赏顾雍之才”,据《三国志·吴志》顾雍本传裴注引《江表传》曰:“雍从蔡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③又引《吴录》曰:“雍字元叹,言为蔡雍之所叹,因以为字焉。”^④顾雍后来官至孙吴丞相,清初王夫之对他评价甚高。据上可知,蔡邕与江南的士人多有来往,利用避难的机会从容阅读了一些江南学者的著作,对江南学术传统有一定的了解。

总之,蔡邕在中原颇有名望,避祸吴会时,不仅吸收了《论衡》那样的异端思想,而且亲自教授学生。蔡邕本人对谈辩的热爱,自然会影响到他与江南士人的交流,因此说江南清谈风气的发生与发展,蔡邕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末与江南士人接触的清谈领袖,并非止于蔡邕一人,还有陈蕃、郭泰、许劭等。初唐王勃《滕王阁序》有“徐孺下陈蕃之榻”句,正反映了陈蕃与徐穉的一段交往。陈蕃是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与李膺、王畅齐名,时人誉为“不畏强御陈仲举”,曾任豫章太守,而徐穉是豫章南昌人,应该是陈蕃任职豫章时结识的。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称徐穉:“穉少为诸生,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星宫、筭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异行矫时俗,闾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县以相还,道无拾遗。四察孝廉,五辟宰辅,三举茂才也。”^⑤徐穉涉历广博,主治今文经学,对纬书和阴阳五行也颇为精通,尤以杰出的道德修养为当时人所称誉,陈蕃、胡广评价为“德行纯备,著于人听”^⑥。陈蕃与徐孝穉的交流殊为

频繁,陈蕃曾以礼举荐徐穉做功曹这样的官,然而徐穉只是前去拜谒致谢而拒绝了邀请。郭泰称他为人清洁高廉,徐穉写信告诫郭泰需早日避世,说:“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棲棲不遑宁处?”^⑦郭泰有所感悟,表示虚心接受,并引为师表。总之,陈蕃、郭泰等与江南士人的交流,有利于中原学风的南渐,进而推动江南清谈的发展。

再如汝南许劭,善于品题人物,《后汉书》说“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⑧,既以许列郭前,则许劭地位略显尊崇;其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⑨。许劭曾避居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许劭知其非真心遇士,又到曲阿投扬州刺史刘繇,“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⑩。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考出许劭在江南地区的活跃时间。中平五年(188)冬十月,徐州黄巾起事,朝廷以陶谦为徐州刺史,击破黄巾军。初平四年(193),即董卓被诛的次年,诏拜陶谦为徐州牧。据上可以推测,许劭寄居广陵是在188—193年间。又孙策平吴,是在初平四年,而许劭卒于豫章,是在兴平二年(195),总之在188—195年间,许劭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南地区,身为清谈领袖,自然会影响到江南的清谈风气。

孔融也是汉末联系中原与吴地学术交往的一个重要人物。融善于谈论,少时即已应对敏捷,《九州春秋》谓之“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⑪,察其情境,似处高堂之上,置身群僚当中,从容谈论,辞气温雅,倾动内外。他尝对虞翻《易注》表达了赞美: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紘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⑫

由此可见,孔融与虞翻、张紘等通过书信共同讨论学术,孔融是中朝名士,乐于推举后进,故江南士人愿意与之结交。

孔融又与盛宪有过交往,《太平御览》载虞翻《会稽典录》曰:

盛宪,字孝章,初为台郎,常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年十余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宴,结

为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贺宪,母昔有宪,宪今有弟。”^{②⑥}

盛宪与孔融是忘年之交,皆善谈论。盛宪在江南享有盛名,因此遭到孙策的忌恨,孔融忧其不能免祸,故上书曹操请求救援,其论盛宪说:“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②⑦}孔融说天下的谈辩士大夫,依靠盛孝章的评论而得以扬名,肯定了盛宪的人物品评,这与汉末中原流行的品鉴风气是一致的。

论人重视仪容风度,属于人物品鉴,这也是清谈的表现方式。《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宋明帝《吴志》:

汉使者刘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并有才秀明达,皆禄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魁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②⑧}

这是中原使者衔命前往江南谒见孙策和孙权,根据他们的仪表来预示将来命运的记载,仅能说明中原士人将习惯的对仪容风度的欣赏移栽到江南人士身上,但看不出江南士人的态度,须赖其它材料的支持。《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吴书》称:“张纯字元基,少厉操行,学博才秀,切闻捷对,容止可观。”^{②⑨}又引《吴录》:“滕胤年十二,孤单茕独,为人白皙,威仪可观。每正朔朝会修觐,在位大臣见者莫不叹赏。”^{③①}滕胤少时尚在汉末中原,其仪容已为人赏识,后在吴地朝觐,孙吴大臣亦为惊叹。而张纯系吴郡人,史臣不仅赞扬他道德和才学,而且提及应对敏捷、容止可观的优点,而这两者与谈辩、品鉴有关。上述材料足以说明汉末吴地士人赞赏容仪的方法与中原的人物品鉴一致,应是受后者的影响。

汉末荆州学派对江东士人也产生了影响。汉末中原大乱,荆州未受扰动,刘表开立学官,招抚儒士,当时俊才辐辏,尤以宋忠最为知名。荆州学派尊重古文,而更注意《易》与《太玄》,学术成果早已流播至江南地区。会稽虞翻对宋忠的解《玄》不以为然,《翻别传》载其上奏说:

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诩号为知《易》。……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又以宋氏解《玄》,颇多谬错,更为立注,并注《明扬释宋》以理其滞。^{③②}

会稽虞氏自零陵太守虞光至玄孙虞翻五

世传《易》,诚乃《易》学世家。他认为宋忠解《太玄经》多有谬误,因此决定亲自作注。具体的学术争议暂且不论,但宋忠所体现的新的学术倾向,流传到了江东,因此虞翻能够看到并予以反驳。陆绩晚虞翻二十三岁,对宋忠的《太玄》有过评论,在《述玄》中说:

镇南将军刘景升遣梁国成奇修好鄙州,奇将《玄经》自随。时虽幅写一通,年尚暗稚,甫学《书》、《毛诗》,王谊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为也。后数年专精读之,半岁间粗览其意,于是草创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为作《解诂》,后奇复衔命寻盟,仲子以所解付奇与安远将军彭城张子布,绩得览焉。^{③③}

初平二年(191),孙坚在与刘表的战斗中身亡,从此双方结怨。建安元年(196),刘表起立学校,招选才俊。后遣使成奇修好孙吴,随身携有《玄经》,则时间应在196年之后。陆绩生于187年,故自称暗稚。据此可知,荆州学派宋忠的《太玄解诂》早经成奇流传到江南。因此王瑶说:“可知此时老、孔并称,学者喜治《易》及《太玄》之风,皆已盛于一时;而宋忠为荆州大师,即以擅长《易》、《玄》著称。……南齐王僧虔《诫子书》以‘荆州八帙’为‘言家口实’,知荆州之学,正为后来清谈家所祖述;而为上接东汉古文经学,下开魏晋玄谈的枢纽。”^{③④}

远在南海的交州学派也值得重视,这是以交阯士燮为首而形成的一个学术派别。刘熙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生年不详,建安初避乱至交州,著有《释名》。据其《序》,此书是对“名号雅俗,各方名(多)殊”^{③⑤}的情况,提出“名之与实,各有异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同上),因此《释名》也是名实之学的重要著作。刘熙在建安中往来苍梧南海之间,教授门徒数百人,深刻影响着交州学风。孙吴的学者程秉、薛综等俱出自刘熙门下,前者著有《周易摘》、《论语辩》,后者以礼学名世,著有《五宗图》。

二

王充的《论衡》,最早为中原士人所欣赏,根据现存文献的记载,应以蔡邕避祸江南时为最早。刘跃进根据《灵帝纪》中的赦书,推知得其罪王智、亡命吴会事发生在光和二年(179)^{③⑥},直到永汉元年(189)蔡邕为董卓所辟,被迫进京赴任,因此说蔡邕在吴地的生活时间应该

介于 179 至 189 年之间。《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引《抱朴子》：

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为高文,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更远,搜求其帐中,果得《论衡》。^⑤

《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抱朴子》与此说法相似,略略增补了一些细节：

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⑥

李贤注又引《袁山松书》^⑦也记载了类似《抱朴子》的事实,袁山松略晚于葛洪,或沿袭葛洪之说,但增补了王朗的事迹,曰：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乃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⑧

总之,蔡邕返回中原后谈玄日进,时人甚为怀疑,从帐中搜查出秘藏的王充《论衡》。据史书记载,王充从洛阳返归故乡“屏居教授”,那么应有不少门徒传播其思想,他的理论在会稽地区应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在蔡邕返回中原的 189 年之前,中原士人似乎并不清楚此书的存在,正因为蔡邕的关系,《论衡》才得以为众人所知。如果《论衡》早已在中原流传,人人得而读之,好事者再取此事敷衍,显然会很拙劣,时人也不可能采摭传世。

同样受到《论衡》沾溉的还有王朗,他是王肃的父亲,其《易》学在魏时立于学官,是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王朗就任会稽太守期间始读到《论衡》,回到中原后变得才华精进。他在献帝播迁西京时与赵昱说服陶谦“遣使奉承王命”,事情发生在初平元年(190)董卓裹挟献帝迁长安时,王朗此举获得嘉奖,受命担任会稽太守,这说明王朗在 190 年前尚未接触到《论衡》^⑨。王朗在会稽太守任上命虞翻为功曹,并询问会稽地区的英俊,虞翻为之列举甚众,详见《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引《会稽典录》。建安元年(196),王朗为孙策所擒,《后汉书》本传李贤注引：“《汉晋春秋》曰：孙策之始得朗也,谴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征朗,策遣之。”^⑩自初平元年到建安三年(199)的十年间,王朗生活在江南地区,与张昭等人有过交往,其学识

应对孙吴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论衡》流播到中原并发生影响,不会早于 189 年。王充生于公元 27 年,据《抱朴子·内篇·自序》称王充年六十作《论衡》,则《论衡》完稿或在公元 87 年左右^⑪。蔡邕入吴之时,此书写竣已近百年,江南士人著作不为中原所知如此。

我们知道,王充的《论衡》在汉末中原已享有盛誉,除了蔡邕秘为宝籍,王朗以此进益外,孔融亦引为谈资。据《后汉书》本传,孔融少时聪敏,善于谈辩,曾以通家子弟的名义得获李膺接见,又当众折挫太中大夫陈炜。本传引路粹奏书称：

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瓠中,出则离矣。”^⑫

此话绝非孔融的独创,而是出自《论衡·物势篇》：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⑬

总之,作为汉末清谈领袖之一的孔融,受到《论衡》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孔融接触《论衡》,很可能是得益于蔡邕的介绍,史书说他与蔡邕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本传曰：“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⑭他对蔡邕的感情如此深厚,且两人都善于清谈,蔡邕远迹吴会获得异书,孔融不容不知了。

那么,《论衡》对于清谈名理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论衡》影响到刘劭《人物志》,而《人物志》在名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汤用彤说：“刘邵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之理,继说骨相,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劭所据者同也。”^⑮刘劭在讨论人物的品鉴时,多有借助《论衡》的方法。刘劭还发展了王充“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政治上“君道无为”、观察人物重视“平淡无味”等观点。正始年间的阮籍也间接受到王充的影响。阮籍父亲是阮瑀,名列建安七子,据《魏志》记载,曾受学于蔡邕。尽管王充对宗教神学所持的尖锐批判立场,未必能够得到世守儒学的蔡邕接受,但《论衡》新颖的观点和玄化的倾向,使蔡邕十分惊异,因此引为“谈助”,加以推广。阮瑀从蔡邕受学,应该受到这种影响,这也构成了阮籍玄

学活动的学术渊源。^④同时,魏代玄学家关于性情的讨论,如王弼的“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和“性其情”等,也应该受到《论衡》之《率性篇》和《本性篇》的影响,如《本性篇》说“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贺昌群先生指出“王充分性为上、中、下三等,以为人性之有善有恶,犹人才之有高有下。后来钟会等之才性四本论,似接踵于王充”^④。王瑶先生在《玄学与清谈》中说王充的非讖纬除迷信的态度,会激发怀疑和批评的精神,从而对杂有阴阳家言的儒术经生不满,引导学术趋于简化,进而接近抽象的讨论,这种态度是“正始玄风的前导”,又“是魏晋玄学发达的先导”^④。总之,汉末清谈风气的形成甚至魏晋名理之学

的发展,王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汉末江南的清谈风气,是在中原清谈名家影响下发生、发展的;中原士人迁官或避祸至江南,与当地士人进行交往,传播了中原的新风气;而这些士人接触到江南的新学术,也使《论衡》的价值得到了彰显,将其携带到中原并大加推崇,《论衡》的辩论才能和崭新思想,推动了中原的清谈风气乃至魏晋名理之学的发展,因此说汉末魏初新学术的发展,是中原和江南士人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范晔《后汉书·李忠传》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56页。后引《后汉书》版本同,不再标出。

《后汉书·卢植传》卷六十四,第2114、2116页。

③③《后汉书·王充传》卷四十九,第1629、1629、1629页。

⑭《后汉书·儒林列传》卷七十九,第2581、2575页。

《后汉书·蔡邕传》卷六十,第2003页。

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1、591、730页。

范晔称“少辩博,能属文”,见《后汉书·边让传》卷八十,第2640页。

⑯《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卷十二裴注引,第370、370页。

⑰《后汉书·边让传》卷八十,第2646、2645页。

⑱《后汉书·郭林宗传》卷九十八,第2230页。

⑲本段受到牟润孙先生《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的启发,见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170—171页。

⑳⑳《三国志·吴志·虞翻传》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5、1323页。后引此书版本同,不再标出。

㉑㉒《三国志·吴志·顾雍传》卷五十二,第1226、1226页。

㉒㉓《后汉书·徐穉传》卷五十三,第1746、1747页。

㉔袁宏《后汉纪》,第420页。

㉕㉖㉗《后汉书·许劭传》卷六十八,第2234、2235、2235页。

㉘㉙《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卷五十七,第1320页。又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后汉孔融答虞仲翔曰:‘未所著《易传》,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聘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君之治《易》,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本祸福,与神会契,可谓探赜穷道者已。方世清,圣上求贤者,梁丘以卦筮宁世,刘向以《洪范》昭名,想当来翔,追踪先烈,相见乃尽,不复多陈。’”第986页。

㉚㉛㉜《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88、1800、1800页。

㉝《三国志·吴书·孙韶传》卷五十一裴注引《会稽典录》,第1214页。

㉞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23页。

㉟㊱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24—25页。

㊲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㊳刘跃进《蔡邕行年考略》,《文史》2003年第1期。

㊴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87页。

㊵曹道衡先生按,此即晋袁山松《后汉书》,见《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收入氏著《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㊶有学者认为蔡邕《独断》已引《论衡》句,又考证《独断》作为建宁五年(172)左右,认为蔡邕亡命吴会始得《论衡》是错误的,详见邵毅平《论衡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㊷《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卷十三,第407页。

㊸邵毅平以为写定于建初(76—84)年间,见《论衡研究》第一章。

㊹㊺《后汉书·孔融传》卷七十,第2278、2277页。

㊻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页。

㊼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㊽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页。

㊾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贺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1页。